

新中国外交的观念变革

杨晓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东城 10007)

[摘要] 新中国外交观念及其变革,与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转变密切相关。这种观念变革展现社会主义原则,承袭中华文化的理念和话语体系,具有深刻的国内动因和国际背景。这种观念变革,从世界观和自我观两个层面系统反映我国外交行为的内在逻辑。新中国外交的观念变革,确定新的历史条件下本国在国际社会的身份和价值,指明其外交行为的主旨、意义和未来方向。

[关键词] 新中国外交; 外交观念; 身份定位; 价值定位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12)04-0056-04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内的社会发展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对外的社会发展实现了从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转变。同时,中国对于世界和自身的认知也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基于自身实践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新中国外交,愈显独特风格。关于新中国外交的研究,历来集中于国家利益、国际格局、政治决策的视角。然而,新中国的外交展现社会主义原则,承袭中华文化的理念和话语体系。因此,深刻理解新中国外交,必须深入探讨新中国的外交观念及其变革。

一、观念 及其外交作用

在外交领域,美国学者朱迪斯·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将观念定义为个人拥有的信念,包括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因果关系等表现形态^[1-1]。更多的学者则将观念等同于文化,认为文化产生身份认同,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2]。中国学者使用“观念”这个概念,具有不同层面的意义:有时指世界观,有时指自

我和他我的界定,有时指思维方法等。

笔者倾向于这样的界定:观念是主体人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它一方面回答“是什么”,与认知相似;另一方面回答“应该是什么”,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历史经验有关。外交观念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是判断世界,二是定位自身。

在本质上,观念是固化的思维模式,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说过,观念造就对世界的认识,就像扳道工一样起到确定方向的作用,使被利益驱动的行为沿着这个方向行进。^[1-2]作为路线图、黏合剂、制度化导因^[3],观念提供决策者判断战略环境的基本图式。决策者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别国的看法行事,而这些看法取决于他们的信念体系^[4]。在外交行为中,观念更多地被行为理解为威胁与目标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一旦选择某种观念,就会从逻辑上排除其他解读。

认识观念的作用,应当避免线性地理解观念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在实际的外交工作中,并不是观念的变化必然带来外交政策的相应调整。观念通过

[收稿日期] 2011-10-07

[作者简介] 杨晓萍(1981-),女,湖北钟祥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在职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决策者内在地指导外交行为,外交行为通过实践影响观念。凭借观念,国家判断威胁的来源,进而变换外交政策。依据外交政策的实践积累,进一步修正观念,甚至形成重新定义的观念系统。

二、中国的世界观:天下与关系性

中国的政治思想没有不可兼容的他者。社会可以无限扩大,文化可以无限交融,政治也可以无限延伸。这个世界性社会往往被称作“天下”^[5]。基于关系眼界的中国价值观,反映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面,被称作“关系性的结构”。

在描述国家间状态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学者受到系统论、系统工程、系统管理等理论的影响,习惯使用“国际体系”的概念。而中国的学者习惯使用“国际格局”的概念。与西方思维中的“格局”即静态的结构不同,中国思维中的“格局”突出变化的、互动的态势,强调“过程性关系本位”^[6]的思考方式,是由己推去的意象表述。中国的国际格局观不仅指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更指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呈现的过程和态势,简称“关系结构”。

单就力量对比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格局经历了从“两极格局”、“一超多强”到“多极化”的转变。就国家间的关系结构而言,中国领导人历来关注大格局框架之下的力量分化和中心转移,以此延伸出暗含中国的位置、关系、意向的形象化描述,如“一条线、一大片”等。因此,“两极格局”存在着“中间地带”、“第三种力量”、“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及其理论表述;“一超多强”格局存在着“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及其理论表达。

与多极化的国际格局观相对应,“尊重文明多样性、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经济全球化向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是中国提倡的21世纪价值观,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需要^[7]。在第三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他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他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8]因而,中国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推进国际

关系民主化。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9]这些思想反驳“中国威胁论”,也反击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

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需要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提出自己的看法。目前,这种认识集中体现在“和谐世界”的理念之中。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系统地阐述“和谐世界”的理念。这种新的国际秩序观承认不同国家的平等与和睦相处,尊重相互的地位、权利和特性。虽然落实的难度很大^[10],但规划了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战略方向^[11],具有相应的发展诉求^[12]。

在整体多极化或非极化(根据各个主要大国综合国力的变化走势和国际政治的重心走向)^[13]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实践秉承“天下思维”、“合作思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与各国建立“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结构”的层次,沿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制裁中国,加速中国国际贸易实现亚洲化。中国与亚洲贸易的成长速度超越同欧美国家的贸易。这是中国政治及其对外政策注重亚洲和周边国家的因果^[14],并且生成“周边外交”、“紧邻外交”等理念。将“周边”的概念视为独立的分析层次和政治话语,与之前的“三个世界划分”完全不同。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强化中国参与地区机制建设的经验感受。通过实践,“周边”的概念不断扩大。美国被视为中国的“特殊周边”。新兴大国——印度的作用受到关注。

三、中国的自我观:革命者与建设者

新中国定位自我身份是历史的、多方位的过程。从明确“社会主义国家”到认知“国际社会一员”,是中国对“革命性”、“例外论”的消融,也是对意识形态的逐渐弱化^[15]。

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强调反侵略、反压迫。其指涉具有明显的敌友观念。革命力量/反革命力量、正义/非正义、反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东风/西

风等多种语汇的核心,是将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大类。这种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两分法,使新中国早期的外交视野和身份认知更多地投射出对立的自我-他者关系。

然而,身份的定位不是恒久的。苏共二十大挑战简单而纯净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认知。19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新中国领导层逐步把苏联归结为半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国家。同一时期,在涉及国家现实利益的许多问题上,中苏之间发生的冲突和争端,加速中国排斥苏联,认定其身份改变。

在中国国内,1970年代末期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刻地影响本国的身份认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从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经历长久的过程^[16]。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强调发展,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强调和平共处。国家利益原则受到外交工作的高度重视。1989年10月,邓小平会见到访的理查德·尼克松,坦率地表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的^[17]。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从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和平外部环境,演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18]。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边界从物质性范畴向制度性、理念性范畴不断扩展。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外交出现多边主义倾向。对此,中外学界称之为中国新外交^[19]。国际社会一员成为中国的主流身份认知:首先,官方表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认为当代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20]其次,官方文件含蓄地认同中国是国际社会一员的身份,如逐步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等。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将国际社会看

成整体,将自己看做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接轨与融入国际社会具有很强的美国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当今的中国认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某些积极作用。而综合国力的增长,也使中国有资格接受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当然,这种负责任不是对美国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对亚太地区和全世界负责。

四、观念内化与政策演进

作为外交观念的时代观,中国最大的转变是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发展、合作,作为外交观念的国际格局观,中国最大的转变是从两大阵营到多极化进程中的和谐世界。两种观念集中反映出中国是什么的身份定位和中国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定位。中国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国际社会的普通一员、平等成员,从体系外的改造者转变为体系内的建设者,更加关注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性建设、发展中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并且适时提出共同致力于和谐世界的构想。担当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构建合作型战略文化、重视相互安全,这些调整凸显当今中国外交战略的新思维。

具体来说,建国之初,新中国认知自己的身份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行结盟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中国获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承认。参加朝鲜战争(1950-1953)、日内瓦会议(1954年)、越南战争(1965-1968)等,中国获得地区强国的认同。万隆会议(1955)树立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形象。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强化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大国的身份认知,突出负责任大国的价值取向,并视自己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在历史上,中国曾以世界的中心自居,以恩、德、义的信条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又遭受过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屈辱。因此,新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决心是真实而坚定的。一方面,中国外交以革命者和改造者的气概,实施一系列创造性举措,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更加深刻地体现出国家领导人思想层面的正义观、是非

观。另一方面,新中国一经诞生,就表现出明显的外张力。它关注和支持境外的革命运动,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能够极大地影响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

当中国视自己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时候,首先要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国际事务。的确,中国已经参与全球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特别是WTO)和安全机制,正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为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而努力。中国积极推动区域裁军和建立信任合作,与有关邻国达成协议和共识来改善地区安全环境。在军控、裁军、防扩散、反恐、金融危机和气候变暖等多个议题上,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进行多纬度、多领域的合作。

然而,观念发挥作用,不仅需要联系特定的时间

和背景,也需要一定的干预变量^[21]。它包括中国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在国际舞台的社会化进程。一方面,体系、结构、传统等框定中国认知自身和世界的观念;另一方面,中国在此观念指导下施行外交行为。观念通过内化指导外交行为,外交行为又通过实践影响观念。

在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化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国际环境中,如果中国的观念和发展能够更好地被世界所认识、所理解,那么,其他主要大国更易于接纳,起码是容忍中国的崛起,鼓励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机制,将中国的发展视为自身发展的机遇,不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发起挑战,那么,中国也将更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和平发展为世界多做贡献,推动全球治理,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 [1] [美]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M].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24^[1] 49^[2].
- [2]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3]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13.
- [4] 李 钢.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和人格因素[J].北京:科学决策,1998 (2):34.
- [5]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现代启示[J].北京:文化纵横,2010 (3).
- [6]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9 (3) 80.
- [7] 楚树龙.中国的世界观和外交战略[J].北京:国际展望,2006 (2).
- [8] 江泽民.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演讲[N].北京:人民日报,2000-11-16 (1).
- [9] 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N].北京:人民日报,2002-04-11 (1).
- [10] 吴建民,等.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J].北京:外交评论,2006 (1).
- [11] 秦亚青.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新理念[J].北京:前线,2006 (12) 31.
- [12] 张晓彤.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J].北京:了望,2009 (47).
- [13] 刘建飞.论世界格局中的非极化趋势[J].北京:现代国际关系,2008 (4).
- [14] 钟飞腾.周边概念与中国的对外战略[J].北京:外交评论,2011 (4) :130.
- [15] 资中筠.百年思想的冲击和撞击[J].北京:美国研究,1996 (4) 26.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K].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38.
- [1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0.
- [18] 楚树龙,郭宇立.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及模式[J].北京:现代国际关系,2008 (2) :1.
- [19] 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J].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4) :11-16.
- [20]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1] 朱立群.转变观念、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J].北京:国际政治研究,2007 (3) :19.

(责任编辑 周晓中)